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困境：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双重枷锁

——以《祝福》《伤逝》为例

宋文心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本文以鲁迅小说《祝福》与《伤逝》为核心文本，结合女性主义理论与社会性别视角，深入剖析祥林嫂与子君两位女性形象在传统伦理束缚下的主体意识觉醒及其局限性。研究指出，祥林嫂的反抗源于生存本能，子君的觉醒则带有启蒙色彩，但二者均未能突破父权制与阶级社会的双重桎梏。鲁迅通过对比二者的命运，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复杂性与社会变革的迫切性。本文进一步结合当代女性主义实践，探讨传统伦理与现代性规训的共谋关系，为当代女性主体性建构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鲁迅；女性主体意识；传统伦理；现代性；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H3 **文献标识码：**[J]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叙事，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体解放的呼唤。在民族危亡与文化转型的双重变奏中，女性问题成为检视传统伦理结构的重要维度。以冰心《春水》（1923）、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萧红《生死场》（1935）为代表的女性书写，构建了早期现代性叙事的范式。这些作品通过女性主体的自我言说，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作为“他者”的沉默状态。

鲁迅的女性书写具有独特的批判性维度。其《祝福》（1924）与《伤逝》（1925）通过祥林嫂与子君的命运轨迹，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复杂性。这种书写策略既延续了《诗经·氓》（公元前11世纪）中女性悲剧的叙事传统，又突破了传统士大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旁观立场。鲁迅以解剖刀般的笔力，剖析女性困境的结构性根源，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叙事进行创造性联结。

国内外学界对鲁迅女性观的阐释，形成多元理论谱系。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中，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1989）指出，祥林嫂的“捐门槛”与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等细节，揭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下，李欧梵、王德威强调，鲁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实为国民性改造的隐喻。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1944）提出“回心说”，认为鲁迅的女性书写是其“抵抗绝望”的哲学实践；美国学者夏志清则从道德批判视角，指出鲁迅对儒家伦理的深刻质疑。

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女性的主体性建构面临双重挑战：其一，如何解构族权、夫权、神权的复合压迫机制？其二，如何避免现代性启蒙中的经济依赖与话语权失衡？这两个问题在鲁迅文本中得到深刻呈现——祥林嫂的悲剧表明个体反抗无法突破系统压迫；子君的失败则警示，脱离经济基础与制度变革的“个性解放”终将沦为空谈。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旨在回答核心问题：传统伦理如何通过制度性压迫与文化规训剥夺女性主体性？现代性启蒙如何重构女性话语，又为何导致主体性的再次失落？鲁迅对女性解放的批判性思考，对当代社会具有双重启示：理论上，需解构传统与现代性的共谋关系，丰富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语境阐释；实践上，需推动社会结构变革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双重胜利。在性别平等成为全球议题的今天，重读《祝福》与《伤逝》，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阐释，更是对当下女性解放路径的深刻反思。

一、祥林嫂：传统伦理下的生存挣扎与主体性萌芽

（一）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女性地位的历史性转折

1907年《女子世界》杂志的统计数据揭示了一个悖论性现实：当全国新式女学堂突破428所、学生总数达1.5万人时，女性解放的表象下仍涌动着传统伦理的暗流。这种“进步”与“压迫”的并存状态，恰是祥林嫂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维新派倡导的“兴女学”与守旧派维护的“三从四德”，在鲁镇这个微观社会中展开激烈碰撞——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擦洗祭器时，她的身体既是礼教秩序的执行者，又是这种秩序的反抗者。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原始图景。

（二）宗法制度的三重物化机制与身体政治

1. 空间规训：从“两颊红红”到“木刻似的脸”

鲁迅通过三次肖像描写构建的视觉叙事，完整呈现了宗法制度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轨迹。初到鲁镇时“两颊还是红的”的祥林嫂，其健康体魄暗含对“未亡人”身份的潜在否定——在宗法体系中，寡妇的存在本身即是对礼教的僭越。这种空间规训在再嫁场景中达到高潮：当她以头抢香案时，身体成为礼教秩序的牺牲品；而改嫁归来眼角带泪痕的形象，则暴露出贞节观念对女性精神的系统性摧残。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在此显现。祥林嫂的每次身份转变，都是被迫进行的性别操演，其主体性在反复的仪式中不断被消解。

2. 经济依附：从劳动价值到符号价值

在鲁四老爷家做工的祥林嫂，其劳动价值被严格限定在“贞洁寡妇”的符号框架内。当她被迫改嫁时，婆婆对其身体的处置权（以八十千钱交易）暴露出宗法制度下女性作为“财

产”的本质。这种经济依附状态在祥林嫂捐门槛后达到顶点：她用十二元鹰洋购买的“赎罪资格”，实质是将自身异化为可交易的宗教符号。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强调的“他者”困境，在此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剥削——祥林嫂的劳动不仅未能换取主体性，反而成为巩固男性权威的经济资本。

3. 话语暴力：从“克夫”议论到“谬种”定论

鲁镇人对祥林嫂“克夫”的议论，构成福柯所说的“话语暴力”。当她试图通过赎罪时，这种行为被柳妈等女性群体转化为新的规训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暴力不仅来自男性，更通过女性群体的共谋得以强化。祥林嫂追问“灵魂有无”时，鲁四老爷的“谬种”定论，实质是宗法制度对异质声音的暴力镇压。这种话语禁锢机制，在当代网络暴力中仍能找到其变体——当女性试图突破传统框架时，往往会遭遇更激烈的舆论制裁。

（三）生存本能与文化无意识的冲突

1. 身体抗争：从撞香案到捐门槛

祥林嫂的撞香案行为，表面上是抗拒改嫁的激烈反抗，实则蕴含复杂的心理机制。从精神分析视角看，这是原始防御——改嫁意味着对前夫家族的背叛，可能引发被抛弃的恐惧。而她反复讲述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反应（PTSD），通过重复叙事试图掌控不可控的悲剧。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恰恰暴露出其主体性在宗法压力下的脆弱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抗争始终未突破身体层面，未能转化为思想层面的觉醒。

2. 话语缺失：从“灵魂有无”到“捐门槛”

当祥林嫂追问“灵魂有无”时，这一看似超前的质疑实则是生存困境逼迫下的本能反应。波伏娃指出，女性往往通过“他者”视角认识自我。祥林嫂的困惑源于宗法制度提供的两种解释框架（地狱惩罚与来世报应）都无法安放其现实痛苦。她的“谬种”之问，实则是用传统话语体系对抗传统体系的荒诞尝试。这种文化无意识的冲突使其主体性萌芽尚未破土即遭扼杀——当她最终接受“捐门槛”的解决方案时，实质上是在用传统逻辑解决传统问题，陷入永无止境的自我救赎循环。

3. 精神奴役：从个体悲剧到结构压迫

柳妈提议的“捐门槛”行为，揭示出精神奴役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它将祥林嫂的罪孽转化为可赎买的商品，使其陷入永无止境的自我救赎；另一方面，这种“救赎”必须通过男性主导的宗教仪式完成，进一步强化其依附地位。这种结构性的精神压迫，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找到新的载体——女性通过购买奢侈品实现“自我救赎”，实质是资本逻辑对传统规训的

现代性转化。祥林嫂的悲剧因此具有跨越时空的警示意义，任何未触及结构变革的“解放”，都可能沦为新的压迫形式。

（四）主体性萌芽的短暂闪现与理论启示

1. 原始生命力的突破尝试

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追问，虽被鲁四老爷斥为“谬种”，却隐含着突破神权桎梏的可能。这种追问不同于子君的启蒙话语，而是生存困境逼迫下的本能反抗。波伏娃强调，女性必须通过“超越性”实现自我。祥林嫂的质疑正是这种超越性的原始形态——她试图用传统框架外的逻辑解释自身命运，这种文化无意识的突破虽显幼稚，却标志着主体性萌芽的开始。这种萌芽的珍贵性在于，它揭示了即便在最严酷的规训环境中，生命仍会本能地寻求突破。

2. 文化无意识的双重束缚

然而，这种萌芽迅速被文化无意识吞噬。当祥林嫂接受“捐门槛”的解决方案时，她实际上是在用传统逻辑解决传统问题，这种循环论证使其永远无法突破系统压迫。她的主体性建构始终在宗法制度预设的轨道上运行，最终沦为制度再生产的工具。这种双重束缚机制，在当代性别表演中仍持续运作——女性通过化妆、整容实现的“自我表达”，往往沦为资本与父权制共谋的产物。

3. 历史镜鉴与当代启示

祥林嫂的命运证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未能真正动摇宗法制度的根基。“兴女学”运动培养的新式女性，要么如子君般陷入经济依赖的陷阱，要么如祥林嫂般被传统伦理重新收编。这种历史经验对当代女性主义实践具有双重警示。其一，主体性建构必须同时突破制度性压迫与文化规训的双重壁垒，任何单维度的突破都可能导致主体性的再次失落；其二，需警惕现代性话语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防止经济独立沦为资本逻辑的新式规训。在性别平等成为全球议题的今天，重读祥林嫂的故事，我们更应意识到：真正的解放，必然是社会结构变革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双重胜利。

二、子君：启蒙话语下的主体性建构与崩塌

（一）经济依赖的具象化

子君的经济依附状态通过三组数据得以具象化呈现。其一，初始资本方面，子君变卖首饰所得约 50 银元（按 1925 年北京物价，约合今 1.5 万元），这构成了其参与现代生活的唯一经济基础。其二，日常支出层面，家庭月支出从 12 银元骤减至 4 银元，其中 2 银元用于购买书籍以满足涓生的知识需求，1 银元用于油盐等子君的生活需求，剩余 1 银元作为应急

储备，这种分配模式深刻暴露出经济决策权的绝对失衡。其三，资产消耗方面，在短短 8 个月内，子君的首饰全部变卖殆尽，而涓生的译稿收入始终未达预期（平均每月仅 3 银元），最终导致家庭经济迅速崩解。

1. 生存资源的单向流动

这种经济依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得以强化。子君变卖首饰的行为，实质上是将自身经济资源单向注入家庭消费，而涓生作为收入主要来源，却未能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这种资源流动的不对称性，为后续的话语权丧失埋下了伏笔。

2. 经济依附与话语权丧失的互构

贝尔·胡克斯在《激情的政治》中指出：“经济控制是权力关系的核心。”子君的处境完美印证了这一论断。当首饰这一最后经济资本耗尽后，其与涓生的对话逐渐从“平等协商”变为“沉默顺从”。涓生手记中“她变得怯懦了”的记载，实则是经济依附导致的话语权彻底丧失。这种互构关系在南希·弗雷泽的“承认政治”理论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子君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夺，更在文化认同层面被贬低为“世俗妇人”，其主体性遭遇双重否定。

（二）主体性崩塌的多维解构：理论视角下的深层机制

子君的悲剧不仅源于经济依赖，更在于启蒙话语本身的虚伪性。其宣言“我是我自己的”看似突破传统，实则陷入南希·弗雷泽批判的“承认政治”陷阱。涓生对“新女性”的想象本质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通过赋予子君“勇敢”等品质，实质是将其纳入男性主导的现代性叙事。当子君无法持续提供这种符号价值时（如油鸡事件），其主体性迅速被解构。这种“伪主体”建构模式，在当代职场“花瓶员工”现象中仍能找到其变体。

1. 启蒙话语的虚伪性：从个体觉醒到符号工具

子君的“新女性”身份始终未能突破符号化困境。涓生通过手记形式构建的叙事，将子君塑造为满足其情感需求的客体，而非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伴侣。这种话语暴力在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中得以映照——吉兆胡同的日常互动，实质是权力关系在微观层面的再生产。

2. 空间规训的升级：现代家庭的权力牢笼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为分析子君的空间困境提供了理论框架。物质空间层面，吉兆胡同的封闭性（无独立书房）限制了子君的知识生产能力；社会空间层面，邻里对“油鸡”的议论构成福柯所说的“异质空间”，通过日常话语实现规训；精神空间层面，涓生对“理想伴侣”的期待，实质是制造了一个需不断自我调整的“精神牢笼”。这种三维规训使子君的“家”从乌托邦异化为全景敞视监狱。

3.文化资本的错位：教育未能转化为主体性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子君悲剧的深层原因。尽管接受新式教育，但子君的文化资本始终处于“被支配”状态。涓生通过翻译西方著作积累的“符号资本”，使其在家庭中占据文化霸权地位。而子君对《易卜生集》的阅读，仅停留在“娜拉出走”的表层模仿，未能内化为批判性主体意识。这种文化资本的错位，导致其主体性建构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三）超越个体悲剧：结构性变革的必要性

子君的命运证明，女性解放不能止步于个体觉醒。贝尔·胡克斯强调的“反抗性认同”理论指出，真正的解放需通过集体行动重构权力关系。这要求经济制度变革，建立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体系，打破“职场玻璃天花板”；文化话语重构，发展女性主义叙事，解构“贤妻良母”的单一标准；空间政治革新，创造支持女性发展的公共空间，如女性合作社、社区中心等。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子君式的悲剧在当代重演。。

三、对比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共谋与异质

（一）经济依附的双重压迫：从身体交易到符号消费

祥林嫂与子君的经济困境呈现出历史语境的差异性与结构压迫的同质性。在鲁镇的宗法体系中，祥林嫂的身体被物化为交易标的，婆婆以八十千钱将其转卖，这种人口买卖通过族权制度获得合法性（波伏娃《第二性》）。其劳动价值被限定为贞洁寡妇的符号框架，改嫁后的精神崩溃实质是文化无意识对女性主体性的吞噬。相比之下，子君的经济依赖更具现代性伪装：变卖首饰的50银元（约合今1.5万元）构成其进入现代生活的初始资本，但日常支出分配暴露权力失衡——2银元用于购买书籍满足涓生需求，仅1银元用于油盐等基本需求。这种资源单向流动在8个月内耗尽首饰储备，而涓生月均3银元的译稿收入始终无法稳定供给，最终导致家庭经济崩解。

（二）文化资本的错位：教育未能转化为主体性

文化资本的占有与运用差异深刻揭示两代女性的命运分野。祥林嫂完全缺失文化资本，其追问“灵魂有无”实为生存困境下的本能反应，却因文化无意识而无法突破传统逻辑。鲁镇人“克夫”“谬种”的议论构成福柯所说的“异质空间”，通过日常话语实现规训。子君虽接受新式教育，阅读《易卜生集》却仅停留在“娜拉出走”的表层模仿，未能内化为批判性主体意识。这种文化资本的错位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下显现为“符号暴力”——涓生通过翻译西方著作积累的“符号资本”，使其在家庭中占据文化霸权地位，而子君的主体性建

构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三）空间规训的三维性：从祠堂到吉兆胡同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为分析两者空间困境提供统一范式。祥林嫂在鲁镇的物质空间（擦洗祭器）、社会空间（鲁镇人议论）与精神空间（贞节观念）中均遭受规训，其初到鲁镇“两颊红红”的描写暗含对“未亡人”身份的否定，改嫁时以头抢香案的行为成为礼教牺牲品。子君则在吉兆胡同的物质空间（无独立书房）、社会空间（邻里对“油鸡”议论）与精神空间（涓生对“理想伴侣”期待）中陷入权力牢笼，这种空间困境的同构性印证了权力关系通过空间再生产的普遍机制。

（四）共谋关系的本质：制度压迫与话语霸权的互文

传统伦理与现代性启蒙在女性规训中形成诡异的共谋关系。前者通过族权、夫权、神权的复合压迫剥夺女性主体性，后者则通过经济依赖与符号暴力重构女性话语，但均导致主体性的再次失落。祥林嫂捐门槛的 12 元鹰洋（今约 3.6 万元）暴露宗教符号对身体的异化，子君“我是我自己的”宣言沦为涓生手记中的符号工具，当无法提供情感价值时（如油鸡事件），其主体性迅速崩解。

鲁迅通过祥林嫂与子君的对比，揭示女性解放需突破双重困境。解构传统压迫机制的同时，必须警惕现代性话语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真正的解放需要物质空间（经济独立）、社会空间（文化认同）与精神空间（主体意识）的三维重构。这要求建立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发展女性主义叙事，推动社会结构变革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双重胜利。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子君式的“伪主体”悲剧在当代重演，实现从经济依附到主体性建构的真正跨越。

结语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与子君，犹如两面历史之镜，映照出女性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性规训夹缝中的生存悖论。本研究通过女性主义理论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双重介入，揭示了二者主体性觉醒的共性与差异：祥林嫂以身体为筹码的反抗，暴露了宗法制度下“人”的商品化本质；子君以爱情为旗帜的启蒙，则凸显了现代性话语中“个体”的符号化困境。这种对比不仅深化了对鲁迅“历史中间物”概念的理解，更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命题——传统伦理的压迫性与现代性规训的虚伪性，在女性解放议题上构成了结构性共谋。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在此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无论是鲁镇祠堂的物质禁锢，还是吉兆胡同的精神牢笼，空间规训始终通过“身体-话语-心灵”的三维网络再生产着性别权力。

这种规训在当代已演化出更隐蔽的形式——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家庭中的“情感劳动”、社会观念中的“贤妻良母”期待，无不延续着祥林嫂与子君所遭遇的逻辑。南希·弗雷泽的承认政治理论为此提供了批判武器：当经济依赖与文化贬低构成双重否定，女性始终被锁定在“他者”位置，这种困境在资本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

鲁迅的文本之所以具有永恒的批判价值，正在于其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双重维度：既要解构族权、夫权、神权的复合压迫，更要警惕现代性启蒙中的经济依附与话语霸权。本研究提出的三维重构路径——物质空间的经济独立、社会空间的文化认同、精神空间的主体觉醒，正是对这种双重维度的回应。当我们将祥林嫂捐门槛的 12 元鹰洋（今约 3.6 万元）与子君变卖首饰的 50 银元进行历史对话，便清晰看到：从身体交易到符号消费，女性解放始终需要突破“经济-文化”的双重资本困境。

这种突破不仅要求法律保障与文化批判并举，更需推动社会结构变革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双重胜利。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言，真正的解放是集体行动重构权力关系的过程。当当代女性主义实践开始关注“照料经济”的价值、推动性别预算的公共政策、构建差异化的主体性话语，我们便在鲁迅开辟的理论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重读《祝福》与《伤逝》，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阐释，更是对当下女性解放路径的深刻反思——唯有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方能在历史的三维空间中，为女性主体性建构开辟真正属于“人”的解放之路。

参考文献

- [1]鲁迅. 彷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李长之. 鲁迅批判[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 [4]朱栋霖. 中国现代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 [5]凯特·米利特. 性政治[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6]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M]. 鲁迅全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The Awakening and Predicament of Femal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Doubl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odernity - Taking "Blessing" and "Sorrow and Death" as Examples

Song Wenxi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1)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u Xun's novels "Blessing" and "Sinking" as the core texts, and combines feminist theory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to deeply analyze the awakening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its limitations of the two female characters, Xianglin's wife and Ziju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thic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Xianglin's wife's resistance originated from her survival instinct, while Zijun's awakening had an enlightenment flavor. However, neither of them could break through the dual shackles of patriarchy and class society. By comparing the fates of the two, Lu Xun revealed the complexity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urgency of social change. This article further combines contemporary feminist practices to explore the co-conspirator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odern discipline, providing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theoretical inspir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female subjectivity.

Key words: Lu Xun Femal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raditional ethics Modernity Patriarchy